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

# 汗青浊酒

【三国演义】与**民俗**文化



鲁小俊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# 汗青浊酒

《三国演义》与民俗文化

鲁小俊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汗青浊酒:《三国演义》与民俗文化/鲁晓俊著. —哈尔滨:  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2003.5  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/陈文新、汪玢玲主编)  
ISBN 7-207-05935-3

I . 三 … II . 鲁 … III . 《三国演义》研究 IV . I207.4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5422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陈春江 李春兰

封面设计: 叶 方

版式设计: 王宇彤

**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**

主编 陈文新 汪玢玲

**汗青浊酒**

Hanqing Zhuoju

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与民俗文化

鲁晓俊 著

---

**出版者**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**通讯地址**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

**邮 编** 150008

**网 址** www. longpress. com E-mail hljrmcbs@yeah. net

**制 版**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

**印 刷** 黑龙江省教委印刷厂印刷

**开 本** 890×1240 毫米 1/32

**印 张** 9

**字 数** 180 000

**印 数** 1—5 000

**版 次**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**书 号** ISBN 7-207-05935-3/G·1359

---

**定价:** 20.00 元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, 印刷厂负责调换)

## 作者简介

鲁小俊，1976 年生，江苏东台人。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，获硕士学位。现任教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。主要学习和研究明清文学，在《武汉大学学报》、《明清小说研究》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，出版有《且向长河看落日——〈儒林外史〉》（合著，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）、《〈三国演义〉：英雄人生》（合著，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年）等。



# 总序

## ——开创文艺民俗学研究的新局面

一套丛书，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，其起点往往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。我们这套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》丛书也是如此。与一般情况稍有不同的是：希望看到这样一套丛书的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，驾鹤西去，未能亲自指导编撰工作和目睹这套丛书问世。

1985年10月，《文史知识》刊发了钟敬文先生的“答《文史知识》编辑部同志访问的谈话记录”，题为《民俗学与古典文学》。他从“古典文学中民间文学所占的位置”、“一般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”和“研究古典文学如何借鉴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”等三个方面阐释了民俗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，其结论是：“民俗学和古典文学研究都属于人文科学，两者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的。人类社会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，这就决定了两种学科之间是可以乃至应该相互沟通的。‘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’，应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，对于丰富古典文学的研究手段、研究角度无疑会有裨益。”其高屋建瓴的概括确立了编撰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》丛书的指导思想。

民俗学的关注领域，主要在三个方面：“(1)风俗方面(如衣服、食物、建筑、婚嫁、丧葬、时令的礼节……)；(2)宗教方面(如神道、庙宇、巫祝、星相、香会、赛会……)；(3)文艺方面(如戏剧、歌曲、歌谣、谜语、故事、谚语、谐语……)。”(顾颉刚《圣贤文化与民众文

总  
序





汗青浊酒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与民俗文化

化》，见苑利主编：《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·民俗理论卷》，13页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2。）（1）、（2）两方面与古典文学的联系，可从“一般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”这一角度来加以把握，如宋玉《高唐赋》的巫山神女，吴均《续齐谐记》的牛郎织女七夕相会，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的斗鸡，离开了对这些民俗现象的了解，我们对古典名著的解读就会留下空白或死角。第（3）方面与古典文学的联系，可从“古典文学中民间文学所占的位置”这一角度来加以把握。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民间文学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，诸如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》、汉魏时期的乐府民歌、由后人补述的上古神话与传说、宋元明清的讲唱文学、明清章回小说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等，都是众所周知的例证；中国文学的若干体裁，也多是从民间文学衍生发展而来的，例如楚辞，王逸在《楚辞章句》中追溯其谱系时说：“昔楚国南郢之邑，沅湘之间，其俗信鬼而好祠，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。屈原……出见俗人祭祀之礼，歌舞之乐，其词鄙陋，因为作《九歌》之曲。”朱熹也认为《九歌》的前身是民间祭歌。这样一些事实表明，“中国古典文学名著”与“民俗文化”之间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。我们的责任是：不仅承认这种关系，而且深入地考察这种关系，以开创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崭新局面。

五四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关注文艺民俗学的学者。鲁迅是其中较早而卓有建树的一位。1927年9月，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，系统梳理“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”，在现代学术史上开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先河。闻一多在用民俗学观点阐释中国古代神话方面用力尤勤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他先后作《伏羲考》、《龙凤》、《姜嫄履大人迹考》，解决了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若干疑难问题。至于数以十计的中国文学史著作，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胡适《白话文





学史》、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、郑振铎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等，其中涉及《国风》、楚辞、汉魏乐府、宋元明清讲唱文学、明清章回小说的部分亦占相当比重。若干专题性的研究著作更蔚为大观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尽管文艺民俗学研究已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就，其缺憾仍是显而易见的。第一，我们对“一般古典文学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”考察甚少。文艺民俗学研究，如日本民俗学家井之口章次在《民证学的位置》一文中所说，主要包括三个方向：“第一方向，为了正确理解文学作品，有必要了解它背后的环境和社会，为此要借助于民俗学。第二个方向，要了解文学素材向文学作品升华的过程，因为在现实上，文学素材往往就是民间传承。第三个方向，再进一步，把文学作品作为民俗资料，也可称之为文献民俗学的方向。”（转引自陈勤建：《民俗学研究评述》，见苑利主编：《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·民俗理论卷》，163页）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，鲁迅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、闻一多《姜嫄履大人迹考》等属于第一个方向；第二个方向即文学源流研究，关于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等小说名著从民间传承到文人写定的种种细致考察属于这一方向；比较而言，第三个方向较为薄弱，在文献民俗学即把文学作品作为民俗资料方面，我们还不够自觉，远远谈不上系统研究。第二，古典文学的研究很少自觉借鉴民俗学的知识、理论和方法，并因此出现了若干阐释偏差。比如，我们对唐代元稹《莺莺传》的误读即因忽视习惯法（不成文法）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造成。在许多读者看来，张生是一个“文过饰非”的负心郎。其实，张生与崔莺莺分手，乃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。宋赵令畤《侯鲭录》卷五说：“（张与）崔之始相得，而终至相失，岂得已哉！如崔已他适，而张诡计以求见，崔知张之意，而潜赋诗以谢之，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。乐天曰：‘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’岂独在彼者耶？”在他看来，崔、张始终是一对有情人，惟其





汗青浊酒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与民俗文化

如此，他们“终至相失”的结局才是悲剧性的。那么，是什么社会压力迫使崔、张分离的呢？简单地说，即习惯法。按照习惯法，一个私奔的女子是没有资格成为妻子的。我们注意到，莺莺在私下与张生结合后，她清醒地意识到，她不能指望张生把她当做正式的妻子来对待；她一再对张生说：“始乱之，终弃之，固其宜也。愚不敢恨。”“既见君子，而不能（以礼）定情，致有自献之羞，不复明侍中帻。没身永恨，含叹何言！”这说明，习惯法是严厉禁止私奔的。白居易新乐府《井底引银瓶》即以“止淫奔”为宗旨。诗用了一位具有莺莺类似遭遇的女子的口吻述说往事、吐露悲怨：“到君家舍五六年，君家大人频有言：聘则为妻奔是妾，不堪主祀奉苹蘩。”这位女子终于未能成为正式的妻子，而莺莺更主动断绝了与张生的联系。她们不可能越过习惯法的障碍。我们过去一味地指责张生，熟视无睹地忽略了一个事实，即：张生虽然不得已抛弃了莺莺，但他依然深深地爱她。对《莺莺传》的误读提示我们：民俗学的知识、理论和方法，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

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》丛书的编撰，即旨在从上述两个较为薄弱的方面推进文艺民俗学研究。其一，丛书致力于揭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所反映的民俗现象，如《三国演义》的关羽崇拜、《水浒传》的江湖习尚、《西游记》的民间信仰世界、《金瓶梅》的市井民俗、《聊斋志异》的狐鬼故事、《红楼梦》的人生礼仪，等等。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作为民俗资料，力求准确、系统地钩稽出相关内容，并适当引用其他文献和田野调查材料作为参证。其二，丛书致力于借鉴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。为了正确理解文学作品，有必要了解它背后的环境和社会，有必要了解民间素材向文学作品升华的过程，有必要了解民俗现象的基本特征，也有必要借助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。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甚多，难以一一列举。就其荦荦大端而言，至少有三个方面：一是注重田野调查，将读万卷书





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。二是注重类型的、比较的研究,注重把握民俗现象的类型化特征,以免因强调个性化和典型化而误解了俗文学的内涵。三是注重地域性的研究,由考察某一地区的文化传统与民情风俗入手,在解读文学作品时力求臻于“同情之了解”的境地。一般读者在面对《国风》、乐府、宋元讲唱文学和明清章回小说时,常常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,比如:《三国演义》何以只在描写诸葛亮时热衷于运用悬念手法?《水浒传》中的三十六天罡何以大都怪模怪样?喜欢闹恶作剧的悟空和常冒傻气的八戒何以成为《西游记》的中心人物?武松在《金瓶梅》中何以显得并不威风?诸如此类的问题,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来阐释,常有一种迎刃而解的效果。借鉴民俗学对古典文学研究大有好处。

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》丛书的编撰,具体到每一部书,不求面面俱到地阐释各名著所反映的全部民俗现象,而以突出重点为基本原则。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相互重复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足够的篇幅来阐释各名著的核心内容。以《水浒传》为例,从题材看,这部小说至少有两个特征值得关注:其一,《水浒传》的题材不是单一的,而是可以用丰富多彩来形容。南宋罗烨《醉翁谈录》著录水浒故事,在“小说”总名目下,《青面兽》归于朴刀类,《石头孙立》归于公案类,《花和尚》、《武行者》归于杆棒类。用较为通行的术语来表示,《石头孙立》属于公案故事,《花和尚》、《武行者》属于豪侠故事,《青面兽》属于绿林好汉故事,由此已可见出水浒故事的丰富性;而现存的《水浒传》百回本中的征辽、征方腊故事等,则属于“说铁骑儿”,以战阵描写为主。其题材多元的情形确非一般小说可比。其二,《水浒传》的题材一方面是丰富的,另一方面又有其占主导地位的题材,即豪侠故事。从豪侠特殊的人文立场和《水浒传》对某种情调的偏爱出发,豪侠们被写成一群具有特殊性格的人:与关心事业和家庭的常人不同,他们对这二者看得很淡,



汗青浊酒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与民俗文化

甚至可以说不在眼下。以鲁智深为例，当他出于正义感拳打镇关西时，假如换了一个同样有正义感但不是豪侠的人，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？毫无疑问，利用身为提辖的权力，要解救金氏父女，只需按照正常的法制程序办事便可达到目的，何至于亲自动手以至弄丢了职务、成为亡命之徒呢？但鲁智深身为豪侠，只有亲自动手才能显出豪侠的风采，至于会不会弄丢官职，那不在他的关心范围之内，豪侠本来就不看重主流社会的事业，官职对于他是无关紧要的。与此相辅相成，家庭也不是豪侠关心的对象。《水浒传》中的好汉，一部分是从来没有结过婚，如武松、鲁智深、李逵、石秀、杨志，一部分是结了婚而并不当回事，如卢俊义、宋江（阎婆惜实际上只能算宋江的外宅）。为什么会如此？这是因为，家庭生活与豪侠是格格不入的，而女性的介入更可能造成对豪侠精力和气质的损害，所以，《水浒传》一再强调它的最出色的好汉“一意打熬气力，不亲女色”。考虑到《水浒传》在题材上的这两个特点，我们讨论《水浒传》，以江湖豪侠的生活为主，以绿林好汉的生活为辅，集中探讨与之相关的民俗现象，而对其他方面则一概从略。对其他名著，如丛书第一辑中的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、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红楼梦》，也采取同样的处理原则。

民俗文化涉及到民俗事象的所有承担者，涉及到民族文化生活中的所有人，它是所有民众的文化。与民俗文化的这一特征相适应，我们这套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》丛书，也一方面注重学术性，注重历史感，注重内涵的深刻与丰富，一方面注重可读性，注重现实感，注重活泼平易的民族气派，目的是贴近民众，进入民众的生活，并在中华文化的建设中发挥实际作用。希望我们的努力得到钟敬文先生在天之灵的认可。希望我们的努力得到读者诸君的认可。希望我们的努力得到从事文艺民俗学研究的各位专家的认可。





在丛书编撰过程中,我所在的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(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)的各位先生以不同方式表示关心和支持,令人感佩。这些先生是: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萧萐父教授、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、中心副主任郭齐勇教授、陈锋教授、中心办公室主任杨华副教授和副主任曾繁宏女士,谨在此一并致谢!

陈文新

2003年2月8日于

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

总

序



7



# 目 录



**总序/1**

**引言 《三国演义》的两个层面与三个世界/1**

## **第一章 桃园结义与结拜兄弟**

- 一 “桃园”本系株官言/6
- 二 桃园之义：刘备集团的伦理基础/9
- 三 狡猾的桃园之义/12
- 四 桃园结义与梁山聚义/17
- 五 三种“桃园结义”/19
- 六 桃园高义今何在/29

目  
录

## **第二章 关公信仰及崇拜**

- 一 “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”/32
- 二 从平凡武将到帝王神圣/37
- 三 关公显圣/43





汗青史话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与民俗文化



四 多神信仰与一神多能/50

五 关帝庙会及其他/56

### 第三章 神奇诸葛亮与巫术文化

一 诸葛亮：多面人生/60

二 方士诸葛亮之一：相术/66

三 方士诸葛亮之二：占卜/70

四 方士诸葛亮之三：通天/77

五 方士诸葛亮之四：幻术/82

六 是巫术，还是科技？/86

### 第四章 解读预言：童谣、异兆和梦

一 童谣：谁解个中味/92

二 面对异兆：顺，还是逆？/97

三 梦的解析/101

四 梦与未来/111

### 第五章 假作真时真亦假

——乱世群雄的日常生活

一 酒：与诗意无关/114

二 红白喜事/122

三 此时无声胜有声：说话的艺术/127

四 “戏”外人生/134

### 第六章 神秘的“南蛮”风情

一 “南蛮”的自然风光/142

二 “南蛮”的民风民俗/146

### 第七章 民众眼中的历史和天道

一 天道的循环与人道的悲剧/154

二 前世、今生和子孙/160



## 第八章 柴堆三国：另一个世界

- 一 英雄人物的漫画像(一)：诙谐/169
- 二 英雄人物的漫画像(二)：夸张/176
- 三 英雄人物的漫画像(三)：解构/180
- 四 日常生活的历史化/186
- 五 英雄人物的“行头”/192
- 六 英雄人物的妻儿们/196
- 七 地方风物与三国传说/200

## 第九章 三国脸谱

- 一 三国京戏与三国脸谱/206
- 二 白脸的曹操/211
- 三 红脸的关公/219
- 四 鼻抹白粉的蒋干/223

## 第十章 “三国”文艺

- 一 “三国”佳联/227
- 二 “大话”三国/231
- 三 玩在“三国”/237

## 主要参考书目 /242

目  
录





## 引言 《三国演义》的两个层面与三个世界

《三国演义》与中国民俗文化，表面上看来，这两者的关系似乎并不密切。

钟敬文先生曾经指出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条干流。“第一条是上层文化，从阶级上说，它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。第二条是中层文化的干流，它主要是市民文化。第三条干流是下层文化，即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。中、下层文化就是民俗文化。”<sup>①</sup>《三国演义》的主角不是市民和农民，而是帝王将相、军阀豪强，在这样一幅上层社会的政治军事生活画卷里，能看到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场景么？

再者，作为历史小说，《三国演义》所关心的是有关历史进程的大事件，它所感兴趣的是兴废存亡的历史经验，它所追求的是历史感和理性深度，而那些无关大体的细节问题，比如岁时风俗，比如饮食服饰，比如人生仪礼，在小说家的笔下都被简化甚至省略了。把《三国演义》当作一个窗口，借以窥视中国民俗文化的面貌（之一部分），也似乎勉为其难。

但《三国演义》与民俗又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们试着从两个层面入手来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，其一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的

<sup>①</sup> 钟敬文《民俗文化学发凡》，收入《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，1996年。





汗青浊酒——《三国演义》与民俗文化

民俗文化，其二是《三国演义》对民俗文化的影响。

先看第一个层面。《三国演义》虽是“宏大叙事”，虽不太留意生活细节，但整部小说仍不时透露出民俗趣味，这主要包括民间信仰、民众意识以及日常生活等几个方面。

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民间信仰最引人注目的是巫术信仰，这在诸葛亮身上有非常突出的表现。诸葛亮的职权和地位，有点类似于文明时代早期的祭司——既是王（皇）权的助手、重臣，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，又负责沟通天地神鬼，主持大型的祭祀活动。但诸葛亮看相占卜、呼风唤雨，无所不能，又超出了祭司的职责范围（祭司虽能通鬼神，但主要还是从事祭祀活动），而和后来的方士同轨。方士一般术有专攻，或算命，或求雨，或堪舆，诸葛亮则是全能型的。方士诸葛亮是联系《三国演义》和巫术文化的重要媒介。

民间信仰的又一种方式是预知信仰，它包括预言、预兆和占卜等。《三国演义》中的童谣不同于一般的儿歌，它实属谶谣，谶谣是一种预言。日月星辰的突变、动植物的异常、梦的发生，这些在民间信仰里都是某种预兆，对预兆需要解析方可知其吉凶，然后才能趋吉避凶。对预兆的解读也是一种预言。还有占卜，它对未来事态的预测凭借的是一些特殊手段，它和看相算命、释梦圆梦等同属于广义巫术的范畴。为了行文方便，我们在第四章《解读预言》中着重谈童谣、异兆和梦，而把看相、占卜等预知信仰都归在第三章巫术文化的门下。

与民间信仰同属于精神民俗的是民众意识，这也是一种世代传承的集体心理习惯。在《三国演义》这样一部历史小说中，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民众对历史和天道的认识。谈天道循环，说善恶报应，《三国演义》讲述的是民众眼中的历史。

就以上几个方面来看，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民俗现象时有所见。现在我们的问题是：一部以政治军事人物为主角，以历史事件为主





要内容的作品怎么会容纳这么多民俗的(中下层社会的)趣味?

这涉及到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三个世界问题。

《三国演义》是一部累积型作品,历史家、民间艺人、小说家等先后参与了其创作过程,他们各自的价值体系在《三国演义》中有不同的表现,因而形成了《三国演义》的三个世界。第一是历史的世界。在此世界,《三国演义》秉承历史编纂的传统,在题材的处理上力求给人以“实录”之感,其价值体系的核心是总结历史经验,道德评价则不太重要。小说记叙曹操与董卓、袁绍、袁术的纠葛,大体属于这一世界。第二是话本的世界。从宋元说话和戏曲发展而来,主要用于表现刘备集团,忽视真实的历史事件而重视装饰性描写,崇拜的是完美的英雄,追求的是道德化的情感满足。第三是笔记的世界。在关注历史进程的同时,将笔记中的生活琐事融入小说,其核心作用是抒写作者“幽居以养静”的闲情逸致。<sup>①</sup>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民俗,主要存在于它的第二个世界。

话本的世界乐于将伟人神化,诸葛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在市民和农民的眼里,诸葛亮不仅道德人格令人尊敬,他的神奇本领更令人崇拜。所以清章学诚批评诸葛亮的“神奇诡怪”很“陋”,实是以第一个世界的标准来衡量第二个世界的人事。至于其他民间信仰以及民众意识的融入,都与《三国演义》第二个世界的来源、价值体系以及审美趣味密切相关。

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,由于《三国演义》的主角是政治军事人物,所以第二个世界中的民俗成份主要是精神层面的——上层社会与中下层社会在精神信仰诸方面有更多的共通之处。那么,《三国演义》写到了物质以及社会层面的民俗没有呢?

有。小说也涉笔婚丧饮食等活动,但叙写非常简略,很少有铺

<sup>①</sup> “三个世界”的观点受惠于陈文新师《论〈三国演义〉文体之集大成》一文,载《武汉大学学报》1995年第6期。